



婆婆兄妹四人中,大舅走得最早。我嫁过来时,他已是挂在老屋墙上的一帧黑白照片,面容清瘦,眼神温和。余下的二舅、三舅与婆婆,伴着果园里岁岁年年绽放的梨花,与我们共度了许多绵长而温暖的时光。

老家的果园场格局独特,几户亲戚的宅院挨得极近,墙垣相连,枝叶相叠,一家炒菜的香气,能顺着风飘进隔壁的灶间。我们家与舅舅家,不止是血脉相连的亲人,更是日日相见、烟火相通的邻居。这种亲密,是城市楼宇间难以想象的诗意。

大舅妈是个极其温婉的人。她话不多,眉眼间总带着一团和气,像初春晒在人背上暖洋洋的太阳。她养育了二子四女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我从未见她有半分急躁。她总是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终日守着一方洒扫扫净的院落,把柴米油盐的日子料理得妥帖安稳。她的厨房里总弥漫着一种温暖的食物香气。孩子们长大后个个孝顺,逢年过节便像归巢的鸟儿从四面八方涌回她身边。顿时老屋里挤挤挨挨,添碗加筷说笑满堂,那份世俗的热闹映着她始终柔和的笑容,仿佛岁月静好本该如此。她就像一棵安静的树,为所有人提供荫蔽,自己却从不开言。

二舅腼腆,爱笑,见人常先咧开嘴。他话虽不多,手脚却从未闲过。春天疏花,夏天打药,秋天摘果,冬天剪枝……他那满脸深深的

跑步锻炼是我的业余爱好,作为高邮跑协一名注册会员,在跑步健身的同时,我也会利用一技之长,为跑友们拍摄参与活动的图片、视频,向上级媒体宣传推介,赞美家乡,传递正能量。通过这么长时间相处,我觉得协会从会长到会员,大家彼此和谐相处,携手共进。一只肉包子的故事,就是其中真实而又暖心的一幕。

记得四个月前,高邮跑协协明会长约请我,说协会准备利用周日在净土寺塔广场搞一次全民健身日主题的“每周驿跑”公益活动,想让我将活动推介到相关媒体上。我爽快地答应了。

那个周日,我凌晨四点多就起床洗漱,从八桥骑电动车,用了一个多小时赶到净土寺塔广场,与上百名跑友会合。然后,我与跑友们从广场出发,沿水游中路、大寨河路、运河东堤、琵琶路一路前行……跑友们激情奔跑的同时,竟相在全民健身公益宣传标语上签名,并不时向沿途群众宣传、散发印有全民健

在我的记忆里,腊月一过,就陆陆续续开始蒸年糕、蒸馒头了。

没有谁家单独蒸的。几户人家凑在一起,选个灶台大、院子大的当临时作坊。隔壁刘大伯家就常是这样的聚集地。架起大蒸笼,点火一烧,雾气腾腾,不一会儿,暖得满屋子人都脱了棉袄。每到这时,我们这群半大孩子比谁都积极,天刚亮就跑过去,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,无非是在灶膛边捡柴火,或者蹲在旁边看大人揉面,心里只盼着早点吃到刚出锅的热乎乎年糕。

年糕是糯米掺籼米做的。糯米要头天晚上泡,泡得手指一捏就碎,再和籼米按比例混在一起,用自家的舂米石臼舂成米粉。我就在旁边看,看米粒慢慢变成细粉,风一吹,米粉粘在脸上,成了大花脸。舂好后,母亲把面粉倒在大盆里,加温水慢慢搅拌。水不能多,多了糕会软塌塌不成形;也不能太少,少了就不好成型,一拿就散。

填面是个细致活,要把每个格子都塞满,

要搬进新的住宅楼了,于是我回了趟老家,准备带上母亲一同到省城生活,共庆乔迁之喜。老家的物件都不要了,但有一样东西我不能丢掉,那就是父亲八年前离世时,一再关照我要收存好的,他外出打工时用的手提工具箱。父亲说,这是他做瓦工时用的工具,要我留作纪念。

父亲兄弟姐妹五个人,爷爷因为儿女多,生活艰难,没有让他们多上学,小学毕业就都辍学了。为子女们今后的生计作想,爷爷让两个女儿学了缝纫机;三个儿子,两个大的跟他学农活,当了农民;父亲最小,也最疼爱,便学了瓦工手艺。

父亲机灵又聪明,满师时手艺已相当出色了。正逢改革开放,经济大发展,一股股打工潮涌向大城市。为了能多赚钱,父亲毫不犹豫成了农民工。他为自己打了个小巧灵便的工具箱,放入瓦刀、水平尺、钢卷尺、线坠子等必用工具,背上一床小被,带了两套换洗衣裳,就告别家人出发了。他一出去就干了20多年,基

老一辈的身影

□ 陈岚

皱纹里,仿佛还能看见去年夏天的汗渍。二舅妈与他性子迥异,爽朗泼辣,嗓门一亮半个果园场都能听见。她做事风风火火,利落干脆,是家里的“外交部长”和“财政大臣”。两人过日子极为俭省,一分钱常掰作两半花,餐桌上最常见的是自家园子的蔬菜。他们把全部心血都浇灌在儿女身上,那种近乎执拗的付出,最终结出了果实——一个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,一个女儿端上了公家的饭碗。每每提及儿女,二舅那惯常憨厚的笑容里便会闪烁出一种难以掩饰的骄傲,那是他们一生辛劳换来的、最踏实的体面。

三舅同样沉默,骨子里却透着一股让人敬佩又心疼的倔。前些年那个识文断字、能说会道的三舅妈先他而去后,三舅的话就更少了。常常一个人坐在院门口望着梨园的方向发呆,身影也显得愈发清瘦孤单。那年一场大病突如其来,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,说他“白了肺”。全家人的心都悬在悬崖边上,他却硬是从鬼门关挣了回来。后来才知道,支撑他的,是一个朴素的念想——要亲眼看着重孙过十岁生日。三舅终究是守信的,等

一只肉包子

□ 吴继原

身科普内容的宣传资料……一路上,我随跑友们一边奔跑,一边拿着相机跟拍活动的图片、视频,忙得不亦乐乎。

活动结束后,我采访了曹明会长以及曹正连等资深跑友。当我回到终点时,负责发放活动补给的地点早已没有人,也没有了补给。由于早上出来得早,还没有来得及吃早饭的我,此时既渴又饿。但我理解,大家为了生活,晨跑结束后,便早点回去各自忙手头事务了。

正当我准备离开时,曹会长喊住了我,将手中的一个小方便袋子递到我面前,和蔼地说:“继原,你还没吃早饭吧,给你肉包子!”我诧异地看着曹会长,只见他微笑着看着我。我知道,

到重孙的生日宴热闹办过,他又静静陪了家人一段平稳的时日,方才像完成所有任务般安然阖目。

婆婆与公公是大家公认的老实厚道人。婆婆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的美德,勤劳、善良、隐忍、持家有道。公公话更少,只是默默劳作,用肩膀扛起一个家。几家亲戚住得近,人情往来便格外稠密。这种“稠密”并非礼节性的客套,而是融于日常的涓涓细流:谁家炖了肉,头一碗总会让孩子端给邻家的老人;谁家园子的梨熟了,站在院门口招呼一声,大家便提着篮子笑着聚拢过去;夏夜的星空下,几张竹椅拼在一起,摇着蒲扇,聊的无非是庄稼的长势、孩子的学业,却能让一身的疲惫在晚风中消散。

如今,风霜带走了老一辈的身影,他们渐行渐远,没人时光深深的河床。那份由他们缔造并守护的血脉温情,如同渗透泥土的养分,在新的枝干上延续。我们这一辈人,虽散居各处,为生计奔波,但无形的线依然牢牢牵着。过年依旧是雷打不动的仪式,大家不约而同回到老宅,女人们在厨房里各显神通,男人们张罗着贴春联、放鞭炮,孩子们尖叫着追逐打闹。下一代的表兄妹们,也如我们当年一样,在果园的田垄间奔跑嬉戏,他们或许分不清复杂的辈分称谓,但一声“舅舅”“阿姨”喊得自然亲热,仿佛这种亲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。

当天早上的补给,除了纯净水,每人只有一只肉包子,这明显是曹会长将自己的那份给了我。

我礼貌地回绝了。但是,曹会长却不依不饶,说:“你从乡下骑车这么远赶来,很辛苦,先吃个肉包子垫一下饥吧……”说话间,他又将那装着肉包子的方便袋递到我面前。我再次婉言谢绝。谦让中,肉包子不慎从方便袋中滑落,掉在了水泥地面上。我俩尴尬一笑,曹会长说:“掉地上弄脏了,真可惜!”我忙弯腰捡起,笑道:“没事,掸掉灰,还能吃!”

我将肉包子放回方便袋,然后放入车篓里。与曹会长匆匆打招呼后,便急忙骑车回单位了。回到单位后,我马不停蹄地整理活动图文、视频,赶写稿子,迅速发到相关媒体。这时,我才用热水将那几只带回来的包子表面灰尘清洗了一下,津津有味地吃起来,还不忘拍照片发给曹会长,并配了文字:“一个包子,暖心!”曹会长则幽默地回复我:“谦让的后果,很‘严重’……”

水,变得软糯,一碗下肚,能顶大半天。

除了年糕,还会蒸馒头。是纯小麦面做的,没有任何馅料。那时候,能吃上白面馒头就已经很满足了,包包子是后来生活好起来才有的事。馒头蒸好后也一样要晒干。房梁上挂着好几个布袋,里面分别装着晒干的糕和馒头,一是怕受潮发霉,二是防老鼠。可我们这群“小老鼠”,哪里防得住?趁大人不注意,搬个小板凳站上去,眯着脚够到袋子,偷偷抠出一两个馒头或糕,揣进衣兜或书包里。到了学校,掏出来和要好的伙伴分着吃,没带的同学围着我们转,眼神里满是羡慕。那得意劲儿,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笑出泪花。

现在自家蒸年糕、蒸馒头的极少了。超市里倒是有卖的,包装精致,样子和小时候的也差不多,可买回家一吃,总觉得少了点味道。不是米不糯,也不是面不香,就是找不到记忆里的那种感觉。具体是什么,我也说不太清楚,或许是少了柴火的温度,或许是少了热闹的人气。

过度成疾,不幸在70岁那年离世了。

回到省城,生活安定下来,我便拿出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——他的瓦工工具箱。打开锁一看,父亲生前用的瓦工工具都在,虽已年久,却没有锈蚀损坏,可见父亲把赚钱养家的工具多么当事啊。在瓦刀旁一摞厚厚的小笔记本,虽已泛黄,但完整无损。随手拿起最上面一本,翻开第一页,上面写着一行字:外出打工天天记。啊!原来是父亲的日记。再掀一页,上面第一行写着:2月24号,昨天过了元宵节,今天和王小明他们开始来苏州打工了。下面紧接着:2月25号,为人家粉刷墙,3.50元,开支吃饭0.60元;2月26日,还是粉刷墙,3.50元,开支0.53元;2月27日,砌内墙,4.00元,开支0.53元;2月28,砌内墙,4.00元,开支0.53元……再看下去,没有别的文字,都是一天一天的打工收入和生活支出,密密麻麻地记着流水账。这特别的“日记”让我心酸,眼泪忍不住一滴一滴落下来。

父亲的“日记”,我要永远珍藏……

斑鸠窝

□ 赵恒彬

离开高邮快半年了,天气渐渐转凉,转眼入了冬。我在南京带孙女,享受天伦之乐,可心里还是惦记着自己的家。记得还是大暑时,女儿怕我们在家天热中暑,约好了一个周末,把我们带到南京,说顺便帮着带带牙牙学语的孙女。

从南京回高邮,便捷得很——地铁转高铁,不过一个钟头的光景,便到了家门口。家中一切如故,只是窗台、桌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,久未住人的家显得没有一点生气。我正感叹着打开窗户通风时,一个意外的惊喜映入我的眼帘:窗台外的空调外机平台上,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斑鸠窝,一只正蹲在窝里孵着鸟蛋的斑鸠静静地看着我。我马上把这个发现发给了南京的孩子们,他们非常高兴,让我不要打扰,好好善待。

有了斑鸠一家做邻居,我走路都放轻了脚步,开关窗更是慢手慢脚。闲下来便扒着窗沿瞄上几眼,看斑鸠夫妇轮流蹲在窝里孵蛋;雌鸟偶尔飞出去,叼回几颗草籽,雌鸟便探出头,轻轻啄食。

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,我惦记着年迈的父母,一早便骑电动车向老家奔去。几个月不见,父母的背更驼了,厚棉衣裹在身上,显得有些臃肿。夏日的暑气晒得他们脸颊黝黑,秋霜又添了几分皴裂,伸手拉我的时候,掌心粗糙得像老槐树的皮,硌得我手心微微发疼。看见我回来,他们一脸兴奋。我关切地问他们在家吃得可好,天冷了床上有没有垫上被褥。“我们又不是小孩,不用你们担心。在家好着呢!”他们倒是关心起我来了,又关心孩子上班辛苦,关心小囡囡成长……

转眼回家呆了半个月了,尽管隔三差五视频报上平安,心头还是放不下孩子们,我准备返回南京。从老家回到邮城家里,想看看小斑鸠长成什么样了。我小心地透过窗玻璃看去,却发现它们都不见了,只留下一个空空的巢。我的心倏地一沉,失落感漫过心口:它们是不慎摔落了?还是找不到食物,饿坏了?种种猜测,在心里盘桓不散。等到查了关于斑鸠的资料才了解:斑鸠幼鸟出壳两周即具备飞行能力,并离开巢穴。我还替它们稚嫩的身体担心时,它们已经离开了家,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望着空荡荡的斑鸠窝,我忽然怔住了:鸟儿尚且如此,何况是人?我们这一辈,从乡下搬到县城;女儿又从县城走出去,在省城安了家。一代又一代人,不都是这样,揣着对老家的惦念,飞向更远的地方,在新的土地上,筑一个属于自己的巢?

早上醒来在手机上刚订了一张下午去南京的高铁票,突然,窗外传来“咕咕咕”的叫声,拉开窗帘一看:一对斑鸠正站在窝前诉说着什么。它们是不是想家了,还是想爸妈了?

我拿起手机告诉女儿,我想留在老家多陪一陪父母,因为那里是我的窝。

撂草堆

□ 葛国顺

田地里的忙碌总跟着季节转,而撂草堆,是夏收秋收后绕不开的重活。撂草堆看起来很简单,实则累得很。先得选块干爽的空地,用砖头或树枝垫起底座,以防地面潮气浸上来。然后要把散乱的秸秆归拢,一把把捆拢,再一个个往上摞。秸秆看着轻,可架不住数量多,摞上几十捆,胳膊就酸得抬不起来,腰杆也直挺挺地僵着。尤其是正午时分,太阳烤得人头皮发麻,麦秸上的细芒钻进衣领,刺得皮肤发痒;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,糊住了眼睛,只能用袖子胡乱擦一把,接着干。

撂草堆不仅是体力活,还暗藏门道,要堆得周正牢固、美观大方,可不是件容易事。这项工作至少需要两人配合,一人站在地面用叉子负责递草捆,一人负责上架堆砌。草堆堆到一米左右高时,上架的人就要踩着草堆爬上去,地面的人将草捆稳稳递到他手中;堆到一米七八的高度,递草的人便需用叉将草把叉起,精准送到上方人手里,确保堆砌过程安全顺畅。有的村民因一时疏忽,没有将麦草捆踩实,草堆堆到封顶阶段突然坍塌,上面的人也跟着从高处滑落到地上。

在过去的乡村,草堆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“标配”,承载着农人的辛劳与生活的烟火气。如今农村,机械化收割后,秸秆要么还田,要么被统一回收,再也见不到当年那些圆滚滚、敦实实的草堆了。可想起当年撂草堆的日子,那些汗水浸透的疲惫,那些邻里互助的热闹,那些看着草堆成型的欢喜,都成了珍贵的回忆。